

烟台故事

被遗忘的车道安

解焕新

2014年10月,芝罘区史志办的彭守业先生为芝罘岛大疃村编纂《芝罘大疃村志》。有一天,他告诉我,大疃村有一块建于民国时期的小学石碑,让我带着工具去给碑文做拓片。

上世纪20年代末,芝罘岛大疃村的安惠民等有名望的乡贤,见本村以前创办的学校规模都比较小、教学不规范、经费也没有保障,于是协商为芝罘岛子弟创办一所规模大、师资水平及教学水平都很高的学校。经他们多方努力筹划,于1930年至1935年间,买地建了63间校舍,新成立的小学被命名为“新民小学”。

校园落成后,校董们刻了两块石碑,记述办学宗旨、建校经过及捐款者姓名、商号、捐款数额等内容。第一块碑为“之罘镇私立新民小学建筑记”,碑文落款为“前福山县教育局局长车道安撰并书 一九三五年乙亥仲夏穀旦立”。

当时,我们对于碑文的书写者车道安一无所知,在第二年出版的《芝罘大疃村志》一书中,是这样写的:“碑是请车道安先生撰文并书写的。据民国年间《福山县志》记载及安惠民之孙安家骥老师介绍,车先生是福山县岗岗区人,大学毕业生,1929年任福山县教育局局长,学识渊博,精通古文,书法也不错,他与安惠民私交很好……曾到安惠民家中避过难,后不知所终。”

2015年,烟台开发区北车家村拆迁。北车家村以前隶属烟台市福山区,原名车家村,1992年8月划归烟台开发区。工作之余我来到这个村里,挨街拍摄老房子。当我逛到村南的时候,眼前比较开阔,出现了一组大院落,院子北侧有一排老房子,再仔细一看,东边和西边都有,旁边还混杂着比较新的房子。北面一排七间,东西各六间(不确定当时南侧建没建房子),屋顶皆覆盖大片的簸箕瓦(又称东洋瓦,系民国时期自日本传入的样式),前端的图案为八卦蝴蝶。三组房子的山墙皆为民国时期烟台流行的模仿潮汕民居风格的五行式,北面的为圆头,东西两侧的为直头。直觉告诉我,这是一所民国时期的学校。

我转回村中,那里有几棵几百年的老槐树。我正在拍照,一位叫车廷俊的老人走了过来,问我是干什么的,我回复了老人后,趁机问那几栋老房子是不是民国时期的学校?老人说是,这是他们村一名叫“车道安”的人于1942年修建的,叫“北车家村完全小学”。我心里一阵惊喜:这不答案来了么!

接着,老人说当时周边几个村子都没有学校,车道安找村里有钱的人募捐,修建了这所小学校,并且从当时福山最好的教师当中,选了两三名到本村小学任教。当时在一面墙上嵌着一块修建学校的石碑(后采访北车家村李维庆,说此石碑在1975年加建校舍的时候拆掉了)。学校建好后,东边的奇章村见被一个比自己小的村子赶超了,顿生攀比之心,也号召村民募捐,建了自己的学校。后来车道安想继续在村北(今开发区海天花园位置)修建一所中学,但是没钱了。他便找到村里一名在烟台街上经商很成功且已安居芝罘的商

人,让他多出点钱,但那个人说“我一分钱也不给”。车道安便采用激将法,说你不捐钱的话以后就不要再回村了,那名商人想了想,觉着有些不妥,毕竟这里是生养自己的故乡,自己的根在村里,于是他找了一个台阶下,让人告诉车道安,“我说过,我一分钱也不拿,我拿全部的”。后来不知何故,建中学的事情不了了之了。

晚上回家后,我在电脑里搜索“车道安”这个名字,但是一点线索也没有,突然想到“车”有繁体字,不如输入繁体字试试?结果一输入,果然搜索到了关于“车道安”的线索。

这份资料就是台湾出版的《山东文献》。在《山东文献》2002年第27卷第4期里,有一篇文章《车道安先生传略》,大意如下:

车道安先生,原名汝逵,以字行,一八九七年二月三日生于山东省福山县。一九二六年毕业于国立北京大学,遂即返乡从事基层教育工作,曾任县立中、小学校长及教育局局长等职。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爆发,参加抗战阵营,引荐全县有为青年赴省训团受训(海阳),参加抗日工作。一九三八年,烟台及沿海各县城相继为日军占领,乃离家乡赴青山(牟平)省立第六联合中学任教,直至一九四〇年冬。当时环境恶劣,学校为安全计,乃西迁日照,遂辞职赴省府教育厅,被委为鲁东各县特教督导队队长,巡视鲁东各县,宣传抗战,协助青年赴后方升学,并建立沦陷区交通站。翌年被委为督学,办事处设于莱阳,协助推动鲁东各县教育工作事宜,以迄抗战胜利……一九四九年春……携眷来台。斯年冬,被邀赴韩国任汉城华侨中学校长之职。一九五〇年朝鲜战争爆发……校舍被毁,乃返台。至战争停止,追校舍重建,乃复返,直至一九六六年底退休,服务侨教整整十二年。初到校时学生不过二百名,退休时,已增至一千三百余名,韩国各地侨校成绩优良的同学均纷纷转学汉城侨中就读。因之校舍不敷应用,乃筹建第二、三大厦,经过炮火洗礼后,工商各业倒闭,仅剩一些饮食业、杂货店及农业而已。因此募捐建校,确属不易。但车先生不辞辛劳,奔走各地,不及一年工夫,卒将第二大厦的建筑费募妥十分之八。第三大厦建筑费并没有要任何人捐一文钱,悉以历年所收学费,节省下来的余款。先生秉性开朗,豪迈慷慨,乐于助人,严以责己,处事勤奋负责,待人宽厚温和,长于组织,精于领导,深受长官器重、亲朋及学生之爱戴。先生日久积劳成疾,于一九八九年八月十八日辞世,一生戮力侨教,颇为后人所敬仰。

这篇文章,大致为我们展现了车道安的一生,他1897年2月3日出生于山东省福山县车家村(后属烟台开发区北车家村)。1926年国立北京大学英语系毕业,1929年-1931年曾任福山县教育局局长,1989年8月去世,享年92岁。

他修建的北车家小学,一直使用到2010年前后,学校迁入新址并更名为烟台开发区第五小学。这所使用了将近70年的学校,为我们引出了烟台教育史上的一段往事、一个被遗忘的热衷教育的乡贤。

往事如昨

一张温馨的老照片:

我在校广播站的日子

孙世国



照片拍摄于1984年6月13日早晨,烟台师范学院图书馆楼前

这是一张我非常珍视的老照片。它是我青春旅途中刻苦求学、奋发向上的见证,承载着一段令我难忘的心路历程。

1981年9月,我考入烟台师范专科学校(今鲁东大学)中文系,我的普通话基础很差,水平在班级倒数。经过一年的刻苦学习,我的普通话理论和实践考核均列班级前茅。365个日日夜夜,付出了多少艰辛多少努力,只有自己知道——校园外弯弯的小巷里,留过我默记读音的身影,逶迤的北山坡顶,曾飘荡着我朗朗的读书声。感谢孙茂恒老师的悉心栽培,感谢同学无私地借给我手提卡式录音机使用。

我幸运地遇到了伯乐——先期进入校广播站主持播音的我的同班同学杨晓方(前右二)。她见我学习刻苦、成绩飞跃,积极推荐我进入校广播站。作为编辑兼播音员,我干得认真而起劲。那个时候,于文书(前排中)是校团委书记(后任烟台师院党委宣传部部长、烟台大学党委书记),李申通(前排右三)任校团委副书记,分管校广播站工作。负责录制和机务播出的是崔老师(前排左三)。崔老师性情和蔼、工作认真,在我们一遍遍录制、剪辑的过程中,他非常耐心细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记得,为了表达对崔老师的敬重和一个时期共事所结下的友谊,毕业分手之际,我给崔老师送了毕业纪念品。虽然礼轻,但却让崔老师非常高兴。

照片是专门为1981级毕业的校广播站通讯员、编辑、播音员而拍摄的。那个时候,照相还是件奢侈的事。能有资格参加校方组织拍摄的合影,我感到十分荣耀。合影者当中,虽然编辑风格不同、播音水准各异,但每个人都小有才气。我们班共有4位同学在校广播站工作,女同学

是杨晓方和唐与娜(中排右二);男同学是我(后排右三)和刘杰(后排右一),其他有同级政史系、化学系、英语系的,还有中文系和其他系下一级的同学。刘瑞辉(后排右二)是我的莱西同乡,1982级中文系学生。他当时从给校广播站写稿、投稿做起,后担任了校广播站的文字编辑。

有一个时期,我跟同级英语系的郭亚楠(前排右一)编排在一组值班,我负责搜集、编辑广播稿件,和郭亚楠一起录播。我从侧面了解到,郭亚楠的父亲在师院工作,她属于教工子女。她身材高挑,亭亭玉立,气质优雅,五官端正,鼻翼微翘,笑窝浅浅,眸若星辰,扑闪扑闪仿佛会说话一般,总是给人一种风含情、水含笑的感觉。跟这样一位青春美少女一起录播,我感到惊艳,心常常怦怦直跳,甚至都不敢正眼看她一眼。每当夏天,偷觑一眼跟我对坐或并排坐着的她,只见她着一袭淡绿色的罗衫,乌黑秀发,玉肌雪肤,加上淡淡的粉香,曾让处在青春期的我脸颊飞红,暗暗心摇神荡。她无可阻挡的青春气息和如花似玉的美貌,曾一度成为我后来择偶的标尺。

我与郭亚楠的合作非常愉快。一起共事时,我总是小心翼翼、毕恭毕敬,除了录播,我们几乎不谈及任何其他事情。平时,我总是盼望着时间过得快点,能再次轮到与她一起录播节目,这样又可以跟她待上一段美好的时光……

照片中,除了我班四位同学毕业后时常有机会见面外,其他的同学和老师都少有见面或是再未谋面。其中,我右边的那位男生(后排右四),乳山籍,是1981级政治系的我记得他在毕业之后便留校工作,并承包了学校的商店。如今这么多年过去了,希望照片中的人都平安幸福。